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留日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

王奇生

在 30 年代的留学界,留日学生人数最多,约占当时出国留学学生总数的一半以上。与欧美留学生相比,留日学生因置身敌邦,外受日本军阀的压迫,内忧故国家园的陆沉,对国难感触最敏锐,其民族情绪最激昂。本文试以 1931- 1937 年的留日学生为对象,力图反映这一群体负笈敌邦的遭际和心态,并考察这一群体是如何回应 30 年代民族救亡的时代大潮的。

—

中国人赴日留学,始于甲午战败之后。战败国屈辱的阴影一直如束如缚地笼罩在留日学生的心坎。曾几何时,日本向中国俯首称臣;千百年间,中国一直是日本的文化母国。而如今,昔日的学生反超过当年的先生,而且还反戈一击,将先生打得惨败。对当时中国人来说,惨败于东洋日本比惨败于西方列强更感到耻辱;而对当时日本人而言,他们把击败大清帝国作为其国力强盛的重要标志,比战胜朝鲜更兴奋,更信心倍增。当中国青年赴日留学时,岛国上下奔走相告,无不引以为自豪,仿佛留日学生也是他们的“战利品”。甲午战争标志着中日两国文化地位的逆转。随着文化地位的逆转,中日两国人各自在对方心目中的地位也为之一变。从此,日本人对中国幡然改态,由昔日的敬仰急转为蔑视,而中国赴日留学生则首当其冲地成为他们轻侮的对象。近代留欧留美的中国学生虽然也都感受过种族歧视的痛苦,但其创痛从来没有留日学生之深切。在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近代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历史就是一部忍辱东瀛的历史。

早在 1906 年,宫崎滔天就告诫日本朝野民众说:“你们旦夕欺侮、讥笑、榨取、剥削、诱惑的‘清国奴’中国留学生,将是新中国的建设者。他们今日含垢忍受着你们的侮辱,你们心中没有一点谦焉之情吗?侮辱他们,势将受他们侮辱。互相侮辱必将以战争相终始。”宫崎滔天的话竟不幸而言中!中国留日学生归国后,往往相率而排日。这自然与他们留学之时“日人有害其感情”有很大的关系。不过,若寻根溯源,无论是日本民众对中国人的轻侮,还是中国留日学生的排日,均与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华野心和侵华步伐紧密相联。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的步步进逼和接二连三的侵略行径,激起全中国民众的愤慨和反抗。留日学生因置身其中,对日本国民由潜意识中流露出来的侮华心态和日本当局公然露骨的侵华野心,洞若观火。正如清末留日学生王拱璧所言:“余游学日本,恰似被盗苦主游观盗窝,无论何处,皆可发现其赃物盗谋;又似老幼被虏,偶入虏居,得见烹翁之羹,醢儿之脍,鼎镬杂陈,备虏饕食,纵使精神麻木,意志疏懒,亦思呼号家人御盗伐虏。”留日学生学成归国,如同刚进行过一场抗日意识的培训,又似刚从“盗窝”、“虏居”归来者呼号家人御盗伐虏那样,疾呼国人排日反日。甲午战争尤其是“二十一条”以后,中国人民反帝的重心由反对西方列强转向反对东洋日本,而留日学生在历次反日运动中都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

如果说 20 年代以前留日学生的反日排日活动是随着日本侵华步伐的时张时弛而时起时伏的话,1931 年九一八的愤火则激变为一发不可收之势。

宫崎滔天:《关于中国留学生》,载《革命评论》1906 年 9 月 5 日。

王拱璧:《东游挥汗录·冠辞》,引自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中译本,第 183 页。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北郊的柳条湖炸毁南满铁路一段路轨。留日学生闻讯后,愤慨臻至极点,当即于9月19日宣布全体罢课。9月23日,东京工业大学的中国留学生首先决议一致归国。归国运动的浪潮随即波及东京其他各校。9月26日,东京17校的留日学生代表集会,决定采取一致行动,其情形异常悲愤激烈。9月29日,大阪、京都、仙台、名古屋、长崎等地的中国留学生也举行集会。各地学生2000余人采取一致行动,选派代表130名赴国民政府驻日公使馆请愿,提出四点要求:下旗归国;对日绝交;对日宣战;发给全体留日同学归国船票。

10月1日,留日学生们再度赴驻日公使馆请愿。但国民政府电令留日学生:“此际宜顾虑学生身份,自尊自重,安心向学。”留日学生要求从事有组织的反日工作,亦未被允许。他们气愤至极,伫立雨中达10小时之久。最后决定推派代表20人先行返国,直接向国民政府请愿,并呼吁国内各界援助全体留日学生归国。10月8日,留日学生监督处发给部分留日学生归国船票。9日,留日学生宣布成立“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抗日救国会”,并发表告国内同胞书,宣称:“我们三千同学之目的在促成和平统一,合力对外”;表示“誓死与国内革命民众合作,一致抗日”。

与此同时,许多留日学生把平日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钱买船票归国。他们归国时,拒乘日本船,改搭他国的轮船。到10月底,回国人数在2000名以上,滞留未归者仅600余人。这600余人大多是无家可归的东北学生和无川资的贫寒学子。这次留日学生的罢课归国行动与以往相比有两个特点:一是运动的政治水平有较大提高;二是更为团结一致,更为坚决。九一八事变关系到祖国的生死存亡,故留日学生同仇敌忾。

《留日学生代表团招待新闻界,报告留日时之工作状况等》,《申报》1931年10月15日。

《留日学生现状》,《申报》1931年11月27日。

对留日学生来说,抗日不止于离日,救国尤不止于回国。他们中断学业,跋涉道途,牺牲可谓大矣。因此,他们觉得:“此种巨大之牺牲,唯有从实际之救国工作中方能取得其代价。”国民政府教育部训令他们先行登记,然后转入国内大学完成学业。但他们担心转学会分散和削弱抗日救国的力量,违背他们辍学归国的初衷,而且可能失去国内民众对留日学生的信仰。因此,他们多数不愿转学。实际上,在离日回国之前,他们即已计划回国以后准备担负的工作。

留日学生回国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向当局请愿。10月17日,回国留学生代表曹修宪等向国民政府和教育部请愿,但都没有得到圆满答复。10月26日,中华留日学生会再次派出全权代表作第二度请愿。综观两次请愿的内容,主要有如下几点:反对不抵抗主义,立即对日宣战,收复失地;反对压迫民众的抗日救国运动;促进和平统一;严惩主持东北“独立”运动的卖国贼;从速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实行强硬外交等。

除向当局请愿外,留日学生的第二个行动就是向民众作抗日救亡的宣传。九一八事变时,国内民众对日本国情尚相当隔膜。对留日学生来说,向民众宣传比向当局请愿更为重要。因而在归国的同时,即发表告各界同胞书,宣布日本侵略满蒙的阴谋,谓日本内阁负有帝国主义的最后使命,唤醒全国民众,团结起来,努力去奋斗,作最后的抗争。接着,他们迅即奔赴救亡第一线,奔走呼号。留日学生因亲历日本,感受极深,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军备、实力,以至民情,均目见耳闻,知其虚实,最有资格作抗日宣传。

留日归国学生的第三个行动是组织日本研究会,向国内民众介绍日本情况。该会下分政治、经济、外交、社会、军事五部,分别从各个方面展开研究工作,然后将研究所得公开发表,使国人了解日

时评:《留日学生返国》,《申报》1931年10月6日。

《留日学生二度请愿之结果》,《申报》1931年10月27日。

本之政治如何,军备如何,经济如何,实力如何,军阀之专横如何,一般民情如何。该会出版《暴露》三日刊,专门提供日本对华国策等方面的信息,为政府制定对日外交方针之参考。

这次二千余名留日学生牺牲学业,满怀悲愤地回到祖国,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留学生们的爱国热忱和抗日救国行动,得到了国内各界民众的广泛同情和热烈响应。他们的奔走呼号,对提高国内民众的抗日意识,消除国内民众对敌情的隔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本来,他们辍学归国时曾坚决表示:“暴日未撤兵前坚不回日求学”,但他们的抗日行动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背道而驰,国民政府不允许他们做有组织的反日工作,只同意他们转入国内大学续学。留学生们的满腔救国热忱受到政府当局的阻挠而中馁。到1931年底,在几经奔走而没有取得多少实际结果的情况下,多数学生只好忍辱负重,被迫重返日本。少数不愿返日的学生或转入国内大学学习,或转赴欧美各国留学,也有的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活动。返日复学的学生不久又因一二八上海事变而相率归国。

二

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后,日本的侵华计划继续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中日关系日趋紧张,在这种情势下,中国留日学生人数按理将日渐减少。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从1934年起,留日学生人数奇迹般地回升。1935年3月为3700人;1935年7月增至4500人,到1935年11月鼎盛时高达8000之谱。此后人数虽有所下降,但1936、1937年,留日人数仍维持在5000-6000人之间,成为中国近代留日史上继1905至1906年、1913至1914年以来第三

《留日学生回国后的情况》,《申报》1931年11月7日。

《留日学生二度请愿之结果》,《申报》1931年10月27日。

《关于留学教育问题》,《留东学报》1935年7月创刊号。

《留日学生突增二千人》,《留东新闻》1935年第5期。

个鼎盛时期。

1930- 1937 历年中国留日学生人数

年月	1930	1931. 5	1932. 6	1933. 5	1934. 11	1935. 11	1936. 6	1937. 6
人数	3049	2972	1421	1357	3000	8000	5662	5934

正当日本加紧侵华之际, 为什么中国学生反而群趋日本呢?

第一, 知己知彼, “师夷制夷”。为了抗日救国, 需要深入了解日本。九一八事变后, 中国各方对日本的注意忽然加强了。一时间, 全国上下形成一股“日本研究热”。这一状况从当时的报刊舆论中即可反映出来。《申报》1934年1月1日报道: “中国的知识阶级最近因研究日本热, 关于日本出版之经济杂志与其它专门科学杂志等, 销路遽增。”在“日本研究热”的影响下, 学习日语, 东渡留学, 在中国青年学生中蔚然成风。日本《读卖新闻》1934年12月28日报道说: “学日语! 学日语! 若说举世之中, 研究日本的热潮正处蓬勃之际, 亦非过言。”“先学好日语, 读通日文书, 才好谈论中日问题! 这是最近中国青年人的呼声。”“学日语, 去日本! 去日本! 学日本! 这种呼声响遍全中国。”从这些报刊言论中可窥当时中国青年赴日留学的心态。

第二, 青年学生失学失业, 寻求出路。1933年开始, 国内大学毕业生失业现象愈趋严重。1934年7月, 北平各大学毕业生联合发起“职业运动大同盟”, 呼吁政府谋求解决办法。在失业危机中, 一部分走投无路的青年负笈日本, 寻求新的出路。

第三, 金价暴跌, 银价上涨, 货币汇率对中国有利。当时日本实行金本位制, 中国实行银本位制。1931年2月, 100中国银元只能换42日元; 到1935年5月, 100中国银元可以换146日元。在这

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 三联书店1983年中译本, 第447-449页。

《华人研究日本热, 日本人认为可恐》, 《申报》1934年1月1日。

引自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 三联书店1983年中译本, 第105页。

种货币汇率对中国有利的情况下,在国内读书,还不如东渡留日合算。这是当时多数中国学生赴日求学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四,留学日本无需护照。193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新的留学章程,规定必须专科以上学校毕业才能出国留学,否则不发给留学证书和出国护照。而当时中国人前往日本无需护照。无需护照,也就意味着可以不受政府教育部所规定的留学资格的限制。于是一些不够留学资格而欲出国者,群相东渡。

第五,进步青年不满国内现状,出洋呼吸新鲜空气。1934年前后,国民党在“安内攘外”政策的驱动下,禁毁进步书刊,“围剿”进步文化活动。而当时的日本,虽然军阀当局对外穷兵黩武,但其国内的左翼文化活动仍相当活跃。各种进步书刊仍准出版发行,连原版和日译本的马列主义著作都在书店公开出售,日本警探对有组织的秘密进步活动侦查监视极严,而对在书店公开购买或阅读进步书籍则不加干涉。相对于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其思想文化环境反而较为宽松。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东京乃成为30年代中期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学生集聚之地。

大批左翼中国知识分子留学日本后,很快将留日学界的抗日救亡活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赴日本留学之前,这些左翼知识分子大多是国内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分子;赴日留学后,置身于日本军阀的统治下,精神上感受到强烈的刺激,其抗日救亡意识更趋激烈,所以很快成为留日学界抗日救亡运动的主导力量。

在日本法西斯的魔爪下,进行公开的抗日举动是绝对不允许的。为了适应斗争环境,留日学子们不得不转换救亡方式,采取诸如成立社团,创办报刊,开展学术研究等形式,从事切实有效的救国努力。

1936年1月《留东学报》第1卷第4期载有“留日团体一览”;

《留日学生激增,汇兑低落最大原因》,《申报》1934年11月5日。

王子光:《忆中共东京特别支部》,《革命史资料》1981年第3期,第186页。

总计留日团体达 90 个。其中学术团体 33 个,同学会 31 个,同乡会 24 个,临时团体 2 个。一个国家的留学生在留学国组织这么多的团体,恐怕在世界留学教育史上亦属罕见!事实上,当时留日学生组织的团体尚不止这些。上述 90 个团体中,左翼团体只列了 3 个。当时左翼留日团体绝大多数是秘密进行活动的,据部分左翼留日学生回忆,30 年代左翼留日团体先后共有二十多个。参加左翼留日团体的人数大约有五六百人,占当时留日学生总数的 1/10 左右。各团体由志同道合者自愿组合,人数多寡不一,有的多达一二百人,有的仅数人。不同左翼团体之间虽然各有侧重,但均以抗日救国为宗旨,故各团体成员之间相互往来,共同切磋,交流心得,颇能相得益彰。

一般说来,团体林立,不利于集中抗日救国力量。那么,当时左翼留日团体何以如此分散呢?据林焕平、蔡北华等人回忆,当时置身日本法西斯统治下,只有采取以专业爱好为基础,三三两两组成小团体,才较易于生存。若团体过大,容易暴露,一旦出事,就会全军覆灭。其次,左翼留日团体名称没有一个以“抗日”相标示,表面上看,均为纯粹的专业学术团体,其目的也是为了掩敌耳目。

全面考察 30 年代左翼留日团体的活动,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创办同人杂志,集聚救国力量。杂志作为一种舆论工具,在宣传和引导救国运动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同人杂志由一部分思想进步的先进分子举办。通过杂志可以将部分具有爱国心的留学生吸引和集聚到抗日的阵营中来。“左联”东京支盟是当时东京留日学生界最重要的左翼团体之一。该组织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即已存在。九一八事变后,东京“左联”的盟员先后回国。1933 年 9

王子光:《忆中共东京特别支部》,《革命史资料》1981 年第 3 期,第 185 页。

林焕平:《从上海到东京》;蔡北华:《回忆东京左联活动》,《左联回忆录》(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版,第 686 页。

月,林焕平留学日本。临行前,“左联”党组书记周扬指示他恢复“左联”东京支盟。林焕平到东京后,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于1933年12月将“左联”东京支盟恢复。支盟恢复后决定以办同人杂志的形式开展活动。首先于1934年8月创办《东流》月刊,接着于1935年5月和7月又相继创办《杂文》和《诗歌》杂志。三个刊物既是“左联”东京支盟的文艺阵地,也是爱国阵地。以杂志为中心,不仅团结了一大批爱好文艺的留日同学,也吸引了一批国内进步文学青年。

左翼留日团体创办的刊物除《东流》《杂文》和《诗歌》外,还有《文艺科学》《世界动向》《国际戏剧》《剧人月刊》《留东妇女》《自然科学》和《东京学联》等。有的公开发行,有的秘密出版;有的独立成刊,有的附作副刊。据蔡北华回忆,这些刊物“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充满爱国救亡热情,敢于揭露黑暗面,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在国内外文化界都发生了很大影响。刊物一到上海,立时销售一空”。蔡北华所称虽非普遍情形,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左翼留日学生文化救亡活动所产生的社会效应。

第二,举行时事座谈会,密切关注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时事座谈会是当时各左翼留日团体开展活动的主要方式。座谈会的内容十分广泛,从国际形势、日本国情、中日外交关系,到国内政局的变化、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及中国社会的性质等,均展开过热烈的讨论。当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东京时,各左翼留日团体立即组织同学以各种名义召开座谈会。会上,留日同学群情激愤地说:“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难道我们在东京的这张书桌就平静吗?”社会科学硏究会的留日同学为此还印发宣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左翼留日学生非常兴奋。他们就如何处置

蔡北华:《回忆东京左联活动》,《左联回忆录》(下),第705页。

颜一烟:《忆中华留日戏剧协会》,《文史资料选辑》(全国),总第109辑,第140页。

王子光:《忆留日学生社会科学硏究会简况》,《文史资料选辑》(全国),总第109辑,第113—117页。

蒋介石,纷纷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不少人主张杀蒋,有的主张把蒋交给延安。不久,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传到东京,一些左翼同学深感失望,也有的不相信可以联蒋抗日。因此,各左翼团体负责人联合召集大型座谈会,传达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使左翼留日同学逐渐达成共识。

第三,联络日本左翼力量,沟通中日进步文化活动。早在20年代,日本左翼力量即已十分活跃。九一八事变后,留日学生开始与日本的左翼团体和进步知识分子取得联系。此时日本的左翼文化力量在日本军阀当局的严酷打击下被迫改变活动方式,中国留日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亦仿效其方式,创办同人杂志即是其中之一。左翼留日团体建立后,与日本左翼力量的联系和沟通更为频繁。林焕平筹备恢复“左联”东京支盟时,曾拜访过日本左翼作家江口涣、中野重治和森山启等人,向他们了解日本的政治形势,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和支持。“左联”东京支盟正式成立后,留日左翼作家与日本左翼作家时相往来,沟通两国进步文化活动。其中交往最密切的是秋田雨雀。秋田雨雀从事戏剧和世界语研究。中华留日世界语者协会成立后,其会员和秋田雨雀、中恒虎儿郎、绿川英子等一批日本世界语者广为接触。在频繁的交往中,24岁的绿川英子和中国留日学生刘仁产生了感情。1936年,这一对异国情侣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上喜结良缘。1937年初绿川英子在中国留日学生丁克等人的帮助下,逃过日本刑警的监视,秘密随夫前来中国。抗战爆发后,绿川英子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际宣传处对日宣传科工作,成为反对侵略的著名日本女战士。而协助绿川英子逃离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丁克等人因此而遭日本警察逮捕,被关押八个月之久。

林焕平:《从上海到东京》,《左联回忆录》(下),第682-683页。

黄乃:《记留日世界语者的活动》,《文史资料选辑》(全国),总第109辑,第113-117页。

刘晓岚:《反对侵华的日本女战士绿川英子》,《武汉文史资料》1984年第4辑。

两国左翼文化力量在日本相逢、集结、沟通、互助,对增进中日知识界的友谊,对两国进步文化运动的发展起到了相得益彰的作用。

第四,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寻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一般人的印象中,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度消沉。事实并非如此。1927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在中国知识界的影响不但没有缩小,反而以更快的速度传播和扩散。30年代前无论是“信马”者,还是“非马”者和“反马”者都承认,辩证唯物论已成为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主流。1933年,艾思奇在《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一文中说:“辩证唯物论的洪流席卷了全国”,“其力量之大,为二十二年来之哲学思潮史中所未有。”1936年,谭辅之在《最近的中国哲学界》一文中也说:“在这时,一个教员或一个学生的书架上,如果没有几本马克思的书,总要被人瞧不起的”,“甚至在课程上都列有辩证法那样的科目。如口里不讲几句辩证法或唯物论,一定不受学生欢迎。”30年代国内知识界的这股“马克思热”随着出国潮而延伸和波及到海外留学界,其中以留日学界的回应最为热烈。当时各左翼留日团体无不以学习马列主义为时尚。不少团体的宗旨就是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培养革命理论骨干。

随着左翼留日团体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不少进步学生急欲与中国共产党取得组织联系。大革命时期,留日学界曾建有中国共产党东京特别支部。1928年日本在济南制造“五三惨案”,中共东京特别支部组织留日学生成立反日大同盟,招致日本当局的注目,中共东京特支的主要领导人郑汉先、童长荣、黄鼎臣等人

艾思奇:《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上海《中华月报》第2卷第1期,1933年12月。

引自许金兴:《怎样评价中国现代哲学》,载《中国哲学史研究》,1988年第1期。

被驱逐回国。此后,中共东京特支一度不复存在。直到1936年暑假,留日学生卢耀武乘回国之便,至北平找到中共党员何锡麟,谈到东京留日学界有许多进步文化团体,急欲寻求党的领导,请求允许在东京重建党的支部。何锡麟将此意转呈给中共北方局的彭真同志。不久,留日学生解树椿也回到北平,通过刘导生、黄敬等人找到彭真,得到同意重建中共东京特支的指示。1936年9月,解树椿返回东京,向部分进步同学传达了中共北方局的指示。很快,中共东京特支正式建立。中共东京特支成立后,介绍和引导进步同学阅读马列主义书籍,创办八开油印小报《星火》,宣传抗日和党的政策。中共东京特支还在留日学生中发展党员,动员和介绍进步同学转赴延安。抗战爆发后,留日学生全体辍学归国,其中左翼留日团体成员多数奔赴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

三

在中国留日史上,留日学生办报刊最轰轰烈烈而卓有成绩的时代,首推晚清辛亥之际。那时留日学生所出的刊物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丰富,宗旨鲜明。抗战前夕留日学生所办的报刊数量仅次于辛亥革命前夕,为留日学生创办报刊的第二个鼎盛期。有人统计清末留日学生共创办报刊64种,而1931-1937年留日学生创办的报刊据笔者初步统计至少有35种。从刊物的宗旨和内容看,辛亥革命前夕的留日刊物政治色彩十分浓厚,除小部分属于学术性外,大都是政治性的,或鼓吹反清革命,或宣扬立宪改革,旗帜非

黄鼎臣:《从中共东京特支到反帝大同盟》,《革命史资料》1980年第1期,第36-39页。

卢耀武:《我所知道的东京世界编译社的一些情况》,《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109辑,第136页。

王子光:《忆中共东京特别支部》,《革命史资料》1981年第3期,第184页。

石锦:《中国现代化运动与清末留日学生》,台北1968年版,第95页。

常鲜明。相比之下,抗战前夕的留日刊物显得平实冷静,表面上看,似以学术色彩为主,没有打出“抗日”的旗帜。但这并不表明留日学生对国内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熟视无睹,袖手旁观,实因置身于日本法西斯的严密控制下不得不有所隐蔽。倘若我们仔细考察,就会发现这些刊物在学术面目的掩护下,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抗日色彩,而其救国宗旨则贯穿始终。在敌巢虎穴中,这种艰难而切实的救国努力显得更加难能可贵。实际上,激发爱国精神是这个时期留日学生创办刊物的潜在动因。1936年2月,一位名叫石吟的留日学生撰文说:“尖锐的监视与压迫之下,留在东京的数千中国学生,对这日益严重的国难,竟毫无一点表示,这是不能不对国内此次被牺牲的同学表示歉意的。但一年来东京的留学界却呈现着一种在留日学生史中未曾有过的好现象,这便是文化事业活跃……东京的中国留学生是绝对没有忘记祖国的灾患的。我们是时刻都在为祖国努力,只以环境不同,努力的方式亦因以稍异。这是应该求得各方面的谅解的。”石吟的话道出了30年代全体留日学子的心声。文化事业的兴盛,办报办刊的踊跃,正是留日学子们对国难的积极回应。

《留东新闻》是当时留日学界的一份比较有影响的刊物。《留东新闻》创刊于1935年6月,由东京新闻学院留日学生傅襄谟和早稻田大学留日学生张健冬、简泰梁等人发起筹办。张健冬担任总经理,简泰梁担任总编辑。其创刊动机,据称乃因“鉴于留日学生达七八千人,华侨达四五万人,日本报章受政府之统制,缺乏真实报导,关于我国消息,尤多不实纪载。余等为报告祖国正确消息于华侨学生,介绍日本政治情形于国内,沟通中日文化,爰集资在东京创办《留东新闻》周刊”。该刊创办伊始,确如其名所示,以报道留日学界消息为主。当时曾得到日本外务省和内务省的许可。日本报纸

石吟:《东京中国学生的文化活动》,《申报》1936年2月6日。

《办 留东新闻 张健冬简泰梁王瑞符被逐回国昨抵沪》,《申报》1937年2月1日。

誉为“留日中国人唯一之舆论”。该刊亦自称“宗旨纯正，毫无政治关系、党派背景”；“为三十年来留日界所未曾有之纯学生新闻”。但这种“纯学生新闻”的色彩并未维持多久。随着日本侵华步伐的加快，《留东新闻》的编辑同仁们认识到，“苟忽略政治外交新闻，殊与创刊意义背驰”，乃逐渐增加对政治外交消息的报道。当时日本多数报纸为其军阀当局的侵华政策张目，故意颠倒黑白。《留东新闻》既想在敌邦虎穴中报道一点事实真相，又要在斗争中求生存，这并非一件容易事，所以尽可能采用比较隐蔽的手法，曲笔透露。尽管如此，它仍难免触怒日本当局。从第四期起，日本当局即开始进行干涉，不时进行检查。苦撑至第九期，该刊同仁为巩固这一难得的宣传阵地，乃依照日本的出版法，缴纳保证金，正式向日本政府注册备案。然而，日本当局依然吹毛求疵，经常因文字或标题等琐屑问题，或进行警告，或予以没收。1936年12月，日本军部少壮派军人在国会上对《留东新闻》表示大为不满，要求立予取缔。《留东新闻》旋即被停。主办人鉴于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而一度离日回国。次年1月13日，张健冬、简泰梁和编辑王瑞符重返东京，翌日即被日本警察拘捕。同月25日，三人被判以宣传抗日赤化的“罪名”，被驱逐回国。

留日学生在报章杂志上所进行的抗日活动，毕竟还有所顾忌。除了公开和“合法”的方式外，他们每逢纪念日等日子，还以书信和传单从事更深入隐秘的宣传。这些宣传文件，有的是由国内的抗日团体送来的，也有的是由日本寄回中国的。他们因置身日本，洞察日本的国情民风和日本军阀的动态。他们将目睹耳闻的情况和研究所得的成果通过专著、报刊、书信、传单、函电等媒介传达给国内民众，对提高国民的救国知识和激发民众的抗日意识，以及对政府当局制定内政外交政策，均起过一定的作用。当时就有人著文对他们的活动作了较高的评价。文称：“近年来的留日学生与前几年的

《留日同学的播音台》，载《留东学报》第1卷第1期，1935年7月。

学生,若单个地比较起来,量多难免贤劣;若整个的比较,则近年留日学生研究之切实,抱负之远大,换言之,其前途之有望性与伟大性,比以前胜强多多……年来国难愈演愈紧,我们不难推想,大部分留日学生比以前向上了,紧张了,并且一定还有多数更觉悟更努力的同学们,正在切实的有效的研究与学习……近年国家难关在于东亚问题,国际风云密布东洋地带,处在此种氛围中将以深刻认识与研究的留东学生,在国家需要上比以前增加了,而其本身的真价值如对国家的责任,对自己的觉悟进而对社会的贡献上,照理也应该比以前提高了。”文章充分肯定了留日学生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然而,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进一步加深,留日学生在日本的处境更加艰难了,被捕被逐之事时有发生。女作家谢冰莹就是一个例子。她于1935年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文学院学习西洋文学。她原拟在日本留学三年,未料1936年4月因拒绝欢迎伪满皇帝溥仪朝日而遭拘捕,被非法囚禁三周后才历尽艰辛潜逃回国。

谢冰莹的经历只是30年代广大留日学生遭遇的一个缩影。在她前后,遭受同样厄运者不乏其人。当时,日本当局对中国留学生的活动密切注意,专门布置了一批便衣警察对付中国留日学生。据说每两个中国留学生中就有一个日本便衣侦探监视着。这也许有些夸张,但日本便衣的猖獗活动,确实使中国留日学生在行动上受到许多限制。这些日本便衣身穿普通西装,出门时和一般人一样,手里多半拿着一个蓝绸布小包袱,在中国留学生经常出入的地方游荡,动不动就闯入中国留学生寓所东张西望,很不客气地讯问中国留学生最近看了些什么书,和哪些人有来往等。他们对留日学生之间的朋友互访、信件往来和团体活动,均进行了严密的监视,

艾秀峰:《留学时期的自白》,载《留东学报》第2卷第3期,1936年7月。

陈子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东京活动的一些情况》,《文史资料选辑》(全国),总第109辑,第107页。

甚至不惜使用各种非法手段来达到他们的目的。私拆留日学生的信件,私入留日学生的住室,偷翻留日学生的文稿日记,几乎成了家常便饭。一旦发现某人有抗日嫌疑,就将其逮捕,驱逐回国。因此,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普遍感到缺少安全保障,人身权利遭到日本军阀的无情践踏。留日学子倍感寄人篱下和种族压迫之苦。1936年5月9日至11日留日中华文化团体在东京神田区举办文化展览会,陈列留日学生所作的诗词、小说和新闻作品。展览会上,日本便衣一一仔细审察,发现其中有两部名为《血恨问答》和《战歌》的作品有反日嫌疑,当即查明作者“陈虹”系广东留日学生元庆荣,旋即元庆荣遣返回国。

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法西斯的狰狞面目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来。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在日的中国学生与日本当局的冲突更加激烈了,中国留日学生被捕被逐的事日益增多。这是暴风雨欲来的一种征兆。1937年5月下旬,“左联”东京支盟成员林焕平、林为梁(林基路)、任白戈、魏晋、魏猛克、张香山和林林等7名留日学生被日本当局以反日作家的“罪名”遣送回国。同年6月12日,东京世界编译社成员杨式谷、卢耀武、王孔昭、杨宪吾、赵圭璧等8名留日学生被日本当局以抗日分子的“罪名”逮捕,经审讯和严刑拷打后被分作四批驱逐回国。同月被捕的还有中华留日世界语者协会的成员丁克、叶君健、黄乃、陈秋帆和李一三等人。有的被驱逐回国,有的被打入牢狱,直到“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才被释放遣归。

留日学生的大批被捕,引起国人的忧虑和深切关注。1937年7

《留日学生遭受残酷痛苦》,《申报》,1937年7月6日。

《留东学生元庆荣遣送回国》,《申报》1936年6月2日。

林焕平:《从上海到东京》,《左联回忆录》(下),第693页。

卢耀武:《我所知道的东京世界编译社的一些情况》,《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109辑,第137页。

黄乃:《记留日世界语者的活动》,《文史资料选辑》(全国),总第109辑,第115-117页。

月6日《申报》报道：“我国留日学生时受日当局无故逮捕，横加压迫，致人心惶惶，无心向学。”当时中国驻日使馆代理大使杨云竹也表示：“对最近不断有留日学生被捕之事，本人深表遗憾！”日本当局与留日学生间这种不能消解的对立气氛愈来愈紧张，终于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体留日学生辍学归国。

各国之间互派留学生，本是国际文化交流的一种好形式。留学生常成为沟通各国人民感情的国民外交使者。然而，自清末以来，日本朝野一方面吸引中国青年学生前往留学，另一方面又极力歧视和轻侮中国留学生。日本当局之所以欢迎中国学生到日本留学，目的无非想藉此养成一批亲日分子，为其侵华活动服务。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疯狂的侵略野心和接二连三的侵略行径，不仅没有使中国学生对其产生文化上的亲和感，相反，极大地激发了留日中国学生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世界留学史上，留学生与留学国之间的对立，很少有如30年代中国留学生与日本当局之间对抗之激烈者。留学生在留学国的遭际，也很少有如30年代中国学生在日本遭遇之惨痛者。自清末以来，国人常警觉留学某国人数过多而担心该国文化在中国潜植和渗透过深，但这种警觉和担心从来没有顾及过留日学生。尽管近代中国留学生一直以留学日本为最多，留日学生几占近代中国留学生总数的一半，但数十年间，日本学校所培养出来的数以万计的中国学生，除极少数成为亲日派和汉奸外，绝大多数成为“排日专家”（当时人的说法）。日本不过是多数中国人学习和吸收西方文化的一个“路近费省”的“中介地”，而极少有真正接受日本文化薰染和洗礼者。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刘兵）